感悟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兴起

——《为了和平》《百年风华》观后感

常州市武进区城东小学 华丽

一直以来，人们以为，文化只有逐渐进步，没有退步之说。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打破了过往的这一主流观念。有人说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这么丰富，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好好发展文化呢？越过越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与世隔绝、人口太少、没有文化交流，于是，只有文化退步这个必然结果。

在我们漫长的农业文明中，从我们发展到的农业文明的巅峰开始，我们其实已经陷入了这个怪圈。没有外部的输入，没有外部的威胁，在习惯了思想的朽化下继续发展，导致最后被工业社会整个抛弃。李约瑟曾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关于这个“李约瑟难题”，一个观点逐渐被接受：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惜没有充足的鱼群，发展不出海洋经济；西北方向有青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屏障，难以与外界及时沟通交流，与世隔绝，产生“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再加上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失误，对工业革命的冲击缺乏及时和有效应对，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说白了，以前中国就是一座巨大的孤岛。

彼时的中国民族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从实业到思想与制度，这是数倍志士仁人的群体记忆，是他们的远大征途。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寻找出路，实业救国首当其冲。实业救国思潮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初期均受其影响。工商兴盛和坚船利炮是当时西方和中国的主要差异，于是富国和强兵就成了当时地主阶级改良主义推动洋务运动的两大目标。但此时中国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依旧强大，开办实业的想法和举动零星出现，还未形成群体意识。

甲午战争之后，实业救国思潮逐步兴盛。深重的民族危机给实业救国思潮兴起提供了外部压力，清朝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支持给实业救国思潮提供了侧面支持，逐渐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则给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阶级基础。洋务运动开办实业、外国资本渗透、新式学堂开办以及学生出外留学等等活动则促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壮大。

清末民初的大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均提出过实业救国主张，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以商立国”，谭嗣同称“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孙中山就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 黄兴也说：“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如果说这些思想家只是把兴办实业作为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把实业救国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那实业救国思想的思想家代表张謇则无疑把实业作为国家变革的最关键推动力量。他总结说：“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白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此兴实业始。”即应当从兴办实业开始，以实业为抓手，逐步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推进国民教育，从而使国家一步步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然而尽管如此，单纯的物质发展无法解决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残留等更本性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具有时代先见性这一品质的社会群体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在已经建立一定物质基础的中国，制度与思想的转变显得更为重要。

人是思想的芦苇。思想是人主体的本质，也是意义价值能够成立的基础，个人理性是文明的精神要素，因此人们不是蚂蚁。理性思想如同根基，而实业繁荣就像根基上的树干，人们只看到树干枝叶的繁盛或者稀疏，而是往往没有看见根基的茁壮或者凋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这不确定的世界，思想的基础性不容置疑。

2021年8月25日